

## 《曹全碑》碑主新考

李清凌

(西北师范大学 文史学院,甘肃 兰州 730070)

[摘要]著名的汉《郃阳令曹全碑》出土以后,清代西北学者张澍将曹全其人收录于他的《续敦煌实录》中,与《后汉书·西域传》中提到的另一位敦煌历史人物曹宽并列。清人王先谦、朱彝尊等人以《碑》证史,认为曹宽就是曹全,《后汉书》误“全”为“宽”,“要当以碑为正”。本文提出几个疑点,认为曹全与曹宽是两人而不是同一人,证实张澍的观点是正确的。

[关键词]《曹全碑》;曹全;曹宽;以碑证史

[中图分类号]K877.42 [文献标识码]A [文章编号]1005-3115(2011)014-0028-02

清代著名学者张澍编撰的《续敦煌实录》,依据明万历(1573~1620)中郃阳县(今陕西合阳县)县民掘地所得汉《郃阳令曹全碑》的内容,收录了敦煌效谷县(治今甘肃瓜州县西)汉代官员曹全及其高祖以下的部分人物,又据《后汉书·西域传》的记载,收录了曹宽其人,将曹全与曹宽看作两个不同的历史人物。然而许多研究者如清人王先谦、朱彝尊等则认为曹宽就是曹全,《后汉书》误“全”为“宽”,“要当以碑为正”。

研究了一辈子金石学和地方史的大学者张澍,难道他会那样粗心,轻易地将见诸名史、名碑的同一个人误作两人?经仔细分析,笔者认为,事情并不像人们所说的那样简单,张澍在这里未必就是错的。《曹全碑》的碑主曹全与《后汉书·西域传》记载的西域戊己司马曹宽根本就不是同一个人。尽管《曹全碑》(以下简称《碑》)和《后汉书·西域传》(以下简称《传》)都记载曹全和曹宽两人带兵讨伐过西域的疏勒王,但《碑》、《传》所载的人名、讨伐疏勒的时间、被讨伐疏勒王与前王的关系、讨伐军的主将和兵员、讨伐的结果等都不一样。因此,笔者认为曹全和曹宽不是同一个人。

### 一、人名不同

《碑》主是曹全,《传》中提到的人叫曹宽,两个人的名字本不一样。清代学者王先谦用《碑》纠史,认为是《传》写错了。他说:

范(指《后汉书》作者范曄)去汉二百余年,而传录文字脱落,“完”、“宽”字形相似,故完误为宽也。其名是全,则碑有确证。

这是说,《后汉书》的作者南朝宋人范曄生活的时

代上距后汉曹全的时代已经200多年,由于该书编撰者收集到的资料“文字脱落”,将曹全“字景完”的“景”字落掉了,又将“完”字误写成了“宽”。他由此认定应将《传》中的“曹宽”按《碑》文改为“曹全”。至于此论有何旁证,不论是王先谦还是其他学者都没有提出,于是上述意见就只能算是揣测之辞,而揣测不能作为确证。

### 二、讨伐疏勒的时间不同

《碑》云,曹全于汉灵帝建宁二年(169)“拜西域戊部司马”,讨伐疏勒国王“和德”;《传》云,建宁三年(170,一作五年),曹宽等讨伐疏勒国王“和得”。这里疏勒国王的姓名有异,尚可以假借来解释,问题不大。关键是曹全与曹宽讨伐疏勒国王的时间不同。按碑文所载,曹全于建宁二年伐疏勒,“和德面缚归死,还师振旅”后,东汉政府即给他升了官,“迁右扶风槐里令(治今陕西兴平县东)”,紧接着,又“遭同产弟忧弃官,续遇禁网,潜隐家巷七年”。这里将曹全当时的行迹排得很清楚,他不可能在建宁三年又到西域去打仗。

### 三、所讨疏勒王与其前王的关系不同

《碑》云,建宁二年(169),疏勒国王和德“弑父篡位,不供职贡”,引起汉曹全的讨伐。《传》则云,建宁元年“疏勒王汉大都尉于猎中为其季父和得所射杀,和得自立为王”。前者云子弑父篡位,新、旧王之间是父子关系;后者说叔杀侄夺权,二者间是侄叔关系。在这里,《碑》与《传》的内容大相径庭,很难说二者记载的就是同一件事情。

### 四、讨伐疏勒的主将和兵员不同

《碑》云:“君(指曹全)兴师征讨。”这是说曹全作为西域戊部司马,他以主将身份独立地带兵去伐已经篡位而不向汉朝进贡的疏勒新王,所带军队除了汉在西



决定的,其军队由敦煌兵,戊己校尉、西域长史部下兵以及焉耆、龟兹、车师前后部等国兵至少三部分组成,而且有3万余人,是一支相当庞大的军队;曹宽只是其中的一个武官而不是主将。这也是《碑》、《传》所载内容很不相同的一个地方。

##### 五、讨伐的结果不同

《碑》云,曹全及其军队“攻城野战,谋若涌泉,威牟诸贵,和德面缚归死,还师振旅,诸国礼遗,且二百万,悉以簿官……迁右扶风槐里令”。《传》则云:“攻桢中城,四十余日不能下,引去。”两处记载的战争结果判若云泥。对此,《后汉书集解》引周寿昌的解释说:“碑云和德面缚归死,司寇(指曹全)还师振旅,则作碑者缘饰之词。”此言何证,也没有下文。按理说,作碑缘饰是常见的现象,但那多是对相关情节的润色和修饰,而不能改变基本的事实真相。作碑如作史,若在所言事件性质上颠倒黑白,以败为胜,则肯定会招致诟病,而达不到赞扬碑主的目的,稍有正义感的作者,都不会做这类事。何况曹全师还以后,即被东汉政府提拔为“右扶风

域的屯兵,按理还有从西域他国借来的军队。《传》则云:“凉州刺史孟佗遣从事任涉将敦煌兵五百人,与戊(一有己)司马曹宽、西域长史张晏,将焉耆、龟兹、车师前后部,合三万余人,讨疏勒”。这段话意谓讨伐疏勒的军事行动是由凉州刺史孟佗

槐里令”,若碑文的基本情节是“作碑者缘饰之词”,那么,曹全振旅后被升官这件事该怎样解释。

在曹全与曹宽是一人还是两人的问题上,持“是一人”态度的清人王先谦认为问题是由“传录文字脱落”所致,已如上述。其他学者如朱彝尊认为是“范蔚宗(《后汉书》作者范曄字)去汉二百年,传闻失真”,因而造成了《传》文的错误。“要当以碑为正也”,即以《碑》文为准,来纠正《传》中的“宽”字,确认《传》中的曹宽就是《碑》中的曹全。清人惠栋说得最为谨慎,他只说《曹全碑》云曹全“拜西域戊部司马,讨疏勒”,其官职不是《传》中写的“戊己司马”几个字(应是“戊部司马”),《碑》中的曹全与《传》中的曹宽“名异”,并未明讲二者是一还是二人。所有持肯定态度者虽然观点明确,然却都是出于个人独断之学,未能提出或提不出有力证据,来证明曹全和曹宽是一人而不是两个人。以证据为生命线的考据名家们,在这里陷入了“臆断”的泥沼。

合乎逻辑的解释,只能是忠实地按照《碑》和《传》的记载,将曹全和曹宽看作两个人;这并不是说他们之间就没有任何关系。可能正如张澍指出的那样:曹宽和曹全都是敦煌曹氏,是敦煌曹氏的一门二将,并且都作过东汉的西域戊部司马。事情的真相可能是这样的:建宁二年(169),当曹全降伏了疏勒王,振旅还师以后,他被任命为右扶风槐里令。而他在西域留下的戊部司马的空缺,由朝廷另选他的弟兄或族人曹宽填补了。建宁三年(170)或五年(172),疏勒王积蓄力量,再次反汉,凉州刺史孟佗遣从事任涉将敦煌兵,与戊司马曹宽等一起前往讨伐,这次虽然兵多势盛,却没有讨到便宜。此论同样出于推测,不敢说就符合事实,但至少是一种合理的解释。

从南朝宋《后汉书》撰成到明万历年《曹全碑》出土,1000多年间没有传世文献或学人提到曹全、曹宽是一人还是二人的问题,只是在《曹全碑》出土和清代考据之风盛行的学术条件和环境下,学者们才提出了这一问题。然而同是清代考据和学术大家,其论有的出言谨慎,有的辄为臆断,对于他们的研究结果,我们在尊重、慎对的同时,理应发扬他们所倡导的重史实、重证据的优良学风,去粗取精,择善而从,以推动学术的发展。

##### [注 释]

① 清·王先谦:《后汉书集解》卷88《西域传集解》,中华书局1984年版,第1030页。

指疏勒国的都城,今新疆喀什市。

朱彝尊:《曝书亭集》卷47《汉鄯阳令曹全碑跋》。